

【文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全球化话语”的文本分析

伊丹丹

(山东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青岛 266590)

摘要:民族国家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形成符合本国利益诉求的“全球化话语”,指导参与全球化的实践。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届领导人有关全球化的论述进行文本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全球化话语”指引了中国从初步认知、适应开放和积极应对、积极参与和主动融入到主动出击和积极引领的全球化实践,也实现了自身的历史演变。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了“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倡议、新理念,丰富、发展了中国“全球化话语”,引领全球化实践朝着公平、公正、全民共享的方向发展。然而,“逆全球化”现象、美国对全球化的话语霸权等给新时代中国的“全球化话语”体系建设带来巨大挑战。

关键词:全球化;“全球化话语”;改革开放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章编号:**1673-5420(2021)03-0072-1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届领导人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做出了对全球化的科学论断。时至今日,中国提出了关于全球化的发展方案,建构了中国“全球化话语”体系。那么,中国“全球化话语”是如何演变的?其主要内容有哪些?中国“全球化话语”体系建设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本文将聚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关于全球化的理念和构想,以中国历届领导人的相关言论为中心,对“全球化话语”进行文本分析,以期更好地理解全球化现象和中国“全球化话语”。

一、“全球化话语”的内涵

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渗透着参与主体的主观目的。当参与主体的价值理念和利益诉求融合在一起时,便建构了一种特定的“全球化话语”,话语建构的现实作用体现在“全球化话语”对全球化的形塑上。国内外学者对全球化的多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包括全球化的起源、发展历史、影响等。然而,鲜有学者将视野聚焦到“全球化话语”的分析之上,相关研究较为匮乏。对“全球化话语”进行梳理,是研究中国“全球化话语”的基础。

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认为,“作为一种历史过程的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是话语建构的过程”^{[1]11},“‘全球化话语’并不仅仅代表独立发生的全球化的进程和趋势,它们在一定条件下也有助于创造和塑造实际过程的全球化,因此有必要分析话语对物质世界变化的建构作用”^{[1]3,11}。托马斯·里斯(Thomas Risse)也肯定了“全球化话语”的现实建构作用,认为“‘全球化’本身绝非一个简单的概念,如果关心现实的社会建构,就会发现全球化包含着对国际现实的独特话语”^[2]。也就是说,全球化具有与之相适应的“全球化话语”,并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社会现实^[3]。安格斯·卡梅伦(Angus Cameron)和罗恩·帕兰(Ronen Palan)也指出,“有关全球化的论述会对全球化的实际过程和制度产生建构效应,但并不是每个论述都是真实的,它们受制于现实检验”^{[4]8}。亚历山大·V.彼得洛夫(Alexander V. Petrov)强调“全球化是一种特殊的话语,当人们谈论全球化问题如经济全球化时,我们谈论的不仅是客观、现实的社会或经济过程,更多的是有关全球化的话语实践”^[5]。

中国学者也对“全球化话语”进行了研究。蔡宗模指出,“全球化不只是一个事实问题,更是一个话语问题……真正决定着全球化面貌的,是各种各样的全球观相互之间的博弈,即话语斗争”^[6]。南佐民认为“全球化不仅是一种经济、政治和文化行为,而且是一种特别的话语行为”^[7]。王秋梅、梁凯音、王岳川等也都强调了从话语视角理解全球化的重要性,以及要提防西方的全球化话语^[8-10]。由上述研究可见,学界关于“全球化话语”的研究主要着重于它的理论建构,缺乏一定的文本研究和分析,对中国的“全球化话语”研究关注度明显不够。故此,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展开探讨,呈现中国“全球化话语”的历史演变,归纳总结该话语的主要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剖析中国“全球化话语”体系建设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二、中国“全球化话语”的历史演变

“全球化”一词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在中国的报纸、政治讲话中,但直到1987年才出现第3篇相关报道。“全球化”相关报道数量的匮乏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改革开放以前新中国与世界的互通是十分有限的。当时,“全球化”被另外一个词——“现代化”代替,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成为当时中国政府的主要任务。董正华总结了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提出“全球化既涉及现代化的国际环境,又是现代化向全球扩散的结果,开始于19世纪后半叶的全球化进程,是由现代化的世界性大浪潮所推动的”^{[11] 47}。因此,现代化在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实则为中国的全局化实践做好了铺垫。张法也曾说过,“对中国学人来说,全球化是现代化的一个新阶段,也是看待现代化的一个新视野”^[1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届政府在全球化蓬勃发展的大趋势下,做出了对全球化的科学判断,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全球化话语”,为中国的全局化实践指引了正确方向。本文对中国“全球化话语”不同阶段的划分主要是依据中国历届政府和领导人做出的相关指示和政策变化,以及中国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

(一)初步认知阶段

1978年施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参与到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邓小平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13] 77},对当时的社会大环境进行了准确的概括。“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14] 64}为此,他带领中国开启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代。邓小平有关改革开放、加强国际交流等的科学判断,表明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全球化的重要性。

1988年之后,有关全球化的新闻文本逐渐增多。在此过程中,邓小平发表了众多有关对外开放、市场的言论。比如,在南方谈话中,他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肯定了对对外开放的市场化倾向,强调了改革的全面性、深度及重要性,也表明中国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中。邓小平对改革开放、时代特征的准确把握,及其在此基础上采取的开放政策,促进了中国的全球化发展。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处于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只能以中国独特的发展进程应对全球化的冲击。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能从邓小平有关改革开放的表述中识别出中国领导人对市场、贸易等全球化具体要素的理解。正是这些话语理念引领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并开启了适应开放和积极应对全球化的时代。

(二) 适应开放和积极应对阶段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成为时代的主题,改革开放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江泽民对当时世界经济形势做出了准确判断,指出“在国际经济领域中,一个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趋势,就是经济全球化”^{[15]198},“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各国经济的相互交流、相互依存日益加深”^{[15]159}。中国国家领导人对经济全球化的判断和把握,一方面证实了中国政府对全球化的认识愈来愈深,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适应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开始积极应对全球化。这既可以体现在中国大量出现有关全球化的报告和著作上,也体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上。

1992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明确界定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对市场经济的肯定反映了中国政府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决心。在此之后,中国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做了很多准备和政策调整。此外,中国政府还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这些都是中国政府积极应对全球化发展趋势的重要举措,提高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水平和层次。

同时,江泽民以批判的眼光对全球化做出了全面审视。他深刻意识到西方国家制定的全球化方案给各国发展带来的不公平及风险。比如,“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15]424},“经济全球化,由于发达国家的主导,使各国各地区在全球发展中的地位和水平进一步出现差异”^{[16]517}。为此,他呼吁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均衡发展,“我们需要的是世界各国平等、互惠、共赢、共存的经济全球化”^{[16]518}。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既进入了改革开放发展的新阶段,也进入了对全球化认识更深层次的阶段。对全球化的各类表述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话语”,为中国积极应对全球化指明了方向,也警醒中国要意识到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给世界其他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

(三) 积极参与和主动融入阶段

中国于2001年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自此,中国社会各界对全球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认识也愈来愈深刻。中国国家领导人频频发表相关言论,表达了积极参与和主动融入全球化的决心。在知识界,除了全球化译著的大量出现外,中国学者撰写的有关全球化的研究报告、书籍等层出不穷。在媒体界,各大媒体对全球化的报道比比皆是。而商界对全球化的重视体现在商人的经营理念发生微妙变化,他们敢于输出产品,与外国产品在全球市场展开竞争。凡此种种皆体现出中国进入了积极参与和主动融入全球化的阶段。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

展仍然是时代主题, 展仍然是时代主题、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17]45}。他强调, “中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我们将继续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 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17]45}。与此同时, 他还提出应对经济全球化负面影响的发展战略, “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 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17]45}。为了避免文化全球化带来的文化霸权、“麦当劳化”等, 胡锦涛提出了“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 尊重世界多样性, 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17]46}。

进入 21 世纪的中国对全球化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and 了解, 中国领导人在坚持中国全球化话语理念的基础上, 发展新时期的中国“全球化话语”, 体现了中国积极融入全球化、实现更大程度的开放发展的意愿。

(四) 主动出击和积极引领阶段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经济全球化呈现出新的特点, 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 引起了多个西方国家的“反全球化”思潮, 甚至是民粹主义的抬头。2016 年唐纳德·特朗普上台后, 表现了极强的“单边主义”倾向, 美国相继退出多个国际组织。2018 年, 特朗普采取了一项与全球化背道而驰的行动, 对其贸易伙伴尤其是中国, 实施关税限制, 这被视为对全球化最大的威胁。2020 年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 再次给全球化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增加了难度。

面对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局势, 习近平于 2013 年首次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中国积极引领新型全球化, 特别是包容性全球化发展的决心, 中国由积极参与和主动融入全球化迈入全面参与和主动引领全球化发展的时期。2017 年,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8]。他还指出, “20 年前甚至 15 年前, 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美国等西方国家, 今天反而是我们被认为是世界上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 积极主动同西方国家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作斗争”^[19]。

习近平有关全球化及国际形势的认识极大地彰显了中国的全球化观, 中国也实现了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转变, 开始表现为主动引领全球化。也就是说, 即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违背历史发展规律, 表达了强烈的“逆全球化”倾向, 中国仍会担负起引领全球化发展的重任, 实现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角色转变决定了中国“全球化话语”的新特点和新方向, 该话语也因“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而得到了升华。

基于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届领导人相关讲话的分析可以得知, 中国“全球化话

语”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规律。在其引领下,中国的全球化实践才得以越走越稳,中国经济才得以蓬勃发展。其实,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球化话语”的文本分析可以发现,它既符合中国自身的发展需要,又与国际形势息息相关,其酝酿、形成与发展无不体现了中国对全球化的科学认识。

三、新时代中国“全球化话语”的内容及特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西方国家的“逆全球化”思潮及行为,中国政府提出了许多新倡议、新理念,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的“全球化话语”,为推动新型全球化、全民共享型全球化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一) 中国“全球化话语”的主要内容

1. 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然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表现出了对全球化强烈的抵抗情绪,在这种“逆全球化”思潮的引导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单边主义”行为。比如,美国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和协定,给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为此,习近平多次强调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的特点,重申中国政府致力于多边主义的决心。习近平提到,“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20]。“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经之路,多边贸易体制为各国带来了共同机遇。”^[21]习近平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针对“逆全球化”思潮提出了中国主张:“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让世界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发展成果。”^[22]与此同时,他强调“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但我们不能就此把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而是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20]。

2.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观

新时代中国“全球化话语”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观,致力于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全球化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是中国政府对全球化理论和实践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推进新型全球化的核心理念,体现了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习近平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提出“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18]

除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还倡导“生命共同体”^[23]的重要性,在引领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高度重视全球治理,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在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全球生态环境的保护。

3.“一带一路”是实现新型全球化发展的具体路径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在新时期对全球化健康发展的科学判断,更是实现新型全球化发展的具体路径。不同于西方的全球化话语,以“一带一路”为中心的“全球化话语”展现的是全球化发展的中国方案,可以发挥联动作用,带动世界其他地区共享全球化的发展机遇,从而解决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刘卫东对此评价道,“‘一带一路’建设将成为世界各国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机制改革的一面旗帜”^[24]。习近平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时也强调,“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境,并希望‘一带一路’可以为实现联动式发展注入新能量,为解决当前世界和区域经济面临的问题寻找方案”^[20]。2018年,习近平再次提到,“要把‘一带一路’打造成为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最广泛国际合作平台,让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各国人民”^[25]。

4. 展现“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新时代中国的“全球化话语”既体现了全球化的客观发展趋势、中国的全球化观和实现新型全球化的具体路径,也体现了习近平对国际政治经济新局势的科学论断,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比如,2017年5月签署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为各国深化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提供了重要机遇,有助于推动实现普惠世界的全球化”^[26]。它的签署反映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国际组织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也是对中国引领的“普惠型全球化”的支持。此外,习近平多次强调要让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增长成果,推动全球化朝着“普惠全民”的方向发展^[25]。

由此可见,新时代中国的“全球化话语”肯定了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尝试通过“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二) 中国“全球化话语”的特点

首先,从理论上讲,中国的全球化话语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延伸,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27]169}也就是说全球化的历史发展进程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全球化不可能是少数国家自我意志的普遍

化,只能是绝大多数历史主体共商共建的结果^[28]。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证明全球化是客观的历史进程,是不可逆转的。虽然反全球化的口号颇具煽动性,但在实践过程中,这往往是行不通的。比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发起的中美“贸易战”、采取的单边主义贸易措施等都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抨击与抵制。

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性是世界瞩目的,全球化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科学的理论支撑,个别国家的反全球化是难成气候的。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具有科学性、前瞻性、指导性,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全球化话语”。正如王一桅提到的,“走出西方中心论,是破;重塑经济全球化话语权,是立。‘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塑造包容性经济全球化,超越经济全球化的不公正、不合理、不可持续”^[29]。作为一种新观念、新话语,中国“全球化话语”具有科学性、学理性,它所推进的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础的全球化既是世界人民所需要的,也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因此,中国的“全球化话语”体系具有强劲的发展势头和强大的生命活力。

其次,中国“全球化话语”强调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20世纪末期,中国政府认识到经济全球化的必然性。同时,共同发展、多边贸易、文明互鉴、和平共处等也成为中国“全球化话语”的主要内容。

最后,我国“全球化话语”的建构目的是在不危害别国利益的基础上,实现中国的发展与全民共享的全球化,这与美国主导的少数人受益的全球化具有根本性的差异。20世纪末期,中国积极应对全球化的影响,并借此实现了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利用“一带一路”开创联动、包容、与世界共享发展成果的全球化,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更是凸显了中国新型“全球化话语”的包容性和普惠性。

四、中国“全球化话语”体系建设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政府积极建构了与全球化发展相适应、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话语”,并以此为指导,力图助推全球化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全民共享的方向发展。为了真正地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中国需要提高其在“全球化话语”中的国际地位,让其他国家共享全球化发展成果。如何构建中国的“全球化话语”体系,是加快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普惠型全球化”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此,我们还需深刻分析中国“全球化话语”体系构建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如此才能找到正确的解决之策。

(一) 西方主导话语及“反全球化”现象带来的挑战

首先,中国“全球化话语”面临的挑战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根深蒂固的霸权主义经济全球化和相关话语体系、价值理念的推崇,特别是对美国全球化话语的推崇。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迎来了快速发展时期,美国是主要受益者和主导者。美国确立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全球化代表了西方国家的主要利益诉求,并使西方国家发展的价值取向和框架体系成为向世界输出的模板,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成为主流的发展理念^[30]。在“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美国历届政府宣传的“全球化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为美国利益服务的全球化,并逐渐成为影响世界全球化进程的强势话语。比如,克林顿在演讲中多次谈到“全球化的不可阻挡的逻辑,但否定了世界其他主体共同参与建构全球化的可能性”^[31]。他还强调美国在领导经济全球化中的作用:“如果没有美国的积极领导,全球化就无法保证和平、财富或环境保护,”^[31]“在发达国家,我们的责任是努力塑造全球化这一进程。”^[32]由此可见,美国的全球化话语强调的是美国在冷战后的霸权领导地位。在2017年互动论坛上,克林顿依然强调美国对外援助和全球化的重要性^[33],表达了对20世纪90年代美国全球化话语的肯定。

美国一直坚持的全球化话语推行的是霸权主义经济全球化,由此衍生的国际标准与规则等反映的是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并试图借此统治世界。这种全球化话语宣传的是西方的话语理念和价值观,所以颇受西方发达国家的支持。正如亚历山大·V.彼得洛夫所说,“全球化意味着全球性的对乌托邦或反乌托邦(敌托邦)的知识化构建。这一乌托邦长期以来甚至主张一种新的、普世性的全球神话话语,企图证明地理政治学中‘传统’工业化国家在新机遇下持续扩张,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秩序的统治具备合理性”^[5]。此外,西方文化话语往往通过扭曲第三世界人性的方式而获得话语中心地位^[34]。

其次,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反全球化现象的频频出现也给中国“全球化话语”体系的建设带来严峻挑战。比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上台后推行“美国优先”的战略,将中俄两国视为竞争对手,国际局势进入大国战略竞争时代。冷战后的全球化国际体系也面临着被重新塑造的局面,英国脱欧、意大利公投否定修宪等反全球化现象令人担忧,西方世界掀起了对全球化的抵制浪潮,在话语建构方面形成了全球化反话语,这种全球化反话语对全球化形成了系统的话语制衡^[7]。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其所作所为会给世界上的其他追随者带来一定的示范作用,难免会造成对中国所倡导的新型全球化,特别是由“一带一路”倡议引领的全球化的抵制。

此外,美国主流媒体在传播美国“全球化话语”及全球化观念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容

小觑的作用。它们也凭借自身的国际影响力,试图抹黑“一带一路”倡议。正如韦宗友所说,“美国媒体更多渲染的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债务陷阱’、‘掠夺性经济’乃至‘新殖民主义’对所在国的威胁,而不是讨论中美合作的可能性”^[35]。美国带头宣扬的“反全球化”以及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抹黑势必会给中国“全球化话语”体系的建设带来负面影响。为此,在建构中国“全球化话语”的过程中,我们既要看到全球化的客观性和历史必然性,又要看到全球化中蕴含的意识形态倾向,特别是要防止非西方世界再次坠入到西方世界构建的帝国主义全球化的圈套中。

在世界新形势下,美国追求的其实是对其绝对有利的全球化,因此营造出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未受到公平对待的话语表述。这些对全球化负面、消极的解读动摇了全球化所需的多元文化认知和普遍公众认同。在当前中国“全球化话语”的构建过程中,一些新话语、新观念不仅受到西方主导话语的挑战,还受到西方世界对全球化抵制的消极影响。面对着这些挑战,中国政府应紧紧抓住世界局势带来的发展机遇,提高中国的全球化话语权。

(二) 中国“全球化话语”体系建设面临的机遇

首先,中国“全球化话语”体系抓住了全球化发展动力的核心,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建构而成的,具有学理性和科学性。它是为了实现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全球化实践而出现的,也必然会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

其次,全球化的发展受到了一些新兴经济体的推崇和支持,这些新兴经济体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自然有意推动全球化稳步前进。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积极向世界展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为全球治理做出了积极贡献,也已经做好承担国际责任的准备。比如,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积极推动新型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的“全球化话语”体系正是为了实现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呼吁全世界人民“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36]。

再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逆全球化选择,对于中国“全球化话语”的建构,也是一种机遇与动力。美国构建的逆全球化的话语表述,实则给中国“全球化话语”的建构让出了舞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中国可与新兴国家一道构建新的国际治理体系的规章制度,推动全球化继续发展。美国当前的逆全球化行为规避了全球治理中的责任,而中国的作为使主权国家得以自主选择、实行适用于本国的全球化政策。

最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无疑给全球化带来了巨大冲击,加深了中国对全球

化体系的认识。全球治理体系是成本巨大、体系庞大的全球公共产品,既需要发达国家的投入和推动,也需要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和贡献^[37]。这场全球性的灾难需要国际合作和协调,实现为人治理、靠人治理,这与中国国家领导人倡导的全球治理理念是一致的。习近平在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话时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国际社会必须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守望相助,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共建美好地球家园。”^[38]在这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中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帮助与支持,并与国际社会一起有效地应对疫情。我国倡导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政治共识,提出了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全球化中国方案,在抗击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中树立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这有助于我国在新的全球化理念的指引下,引导全球化朝着公平、公正、全民共享的方向发展。

由此可见,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做出的巨大贡献,以及在国际社会中树立的良好形象必然会推动世界各国对中国“全球化话语”体系的认同。提升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话语权,建构中国“全球化话语”体系,成为中国引领新型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方面。我国应紧紧抓住这些机遇,既尊重全球化的历史规律和客观必然性,又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建构能够实现普惠型全球化的“全球化话语”体系。

五、结 语

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取得的成就表明,中国只有走经济全球化发展之路,利用全球化提供的历史机遇来发展壮大自己,制定可行的对内对外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提高适应和利用经济全球化的能力,才是在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下的腾飞之路。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的话语体系、价值导向和规则体系,是不公平不公正的。中国亟需利用“一带一路”重塑经济全球化话语权,破除西方全球化话语的“神话”,从而塑造自己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总体而言,中国的“全球化话语”既符合经济全球化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也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39]。它是不同于美国全球化霸权话语的新式话语,深植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具有科学性、学理性和普惠性,能够引领全球化朝着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在此过程中,新闻媒体、知识精英需按照中国政府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做好中国“全球化话语”的对外宣传工作,利用“一带一路”倡议“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全球化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

- [1] FAIRCLOUGH N. Language and globalization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 [2] 托马斯·里斯.全球化与权力: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10):24-37.
- [3] HAY C, ROSAMOND B. Globalization,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economic imperatives [J].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2003(2):147-167.
- [4] CAMERON A, PALAN R. The imagined economies of globalization [M]. London: Sage, 2004.
- [5] 亚历山大·V.彼得洛夫.现代社会的文化与全球化的神话话语[J].连晨炜,译.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19(1):60-67.
- [6] 蔡宗模.全球化:一个话语问题[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04-10(01).
- [7] 南佐民.全球化构建中的话语制衡[J].国外社会科学,2007(2):46-50.
- [8] 王秋梅.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分析[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38-41.
- [9] 梁凯音.论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话语权[J].广东社会科学,2015(1):85-91.
- [10] 王岳川.全球化与新世纪中国文化身份[J].社会科学战线,2003(6):195-204.
- [11] 董正华.世界现代化进程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 [12] 张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史的两大观念:现代化与全球化[J].思想战线,2010(1):89-94.
- [13]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5] 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16]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 [17] 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 [18]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9]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EB/OL].[2020-05-01].http://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01c_128972667_2.htm.
- [20]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 2017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EB/OL].[2020-10-10].http://www.china.com.cn/v/news/2017-01/18/content_40128041.htm.
- [21] 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EB/OL].[2020-10-10].<https://www.sogou.com/link?url=6IqLFeTuIyuyH1tDKnToq3wKj0ZGENRRgifANqNhhObs694xLs9EI0hYqQIyPUr7xKo7V-eTc8>.
- [22] 习近平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的讲话[EB/OL].[2020-10-10].<http://cpc.people.com.cn/n1/2019/0327/c64094-30997013.html>.

- [23] 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2020-10-10].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12/c_118112746.htm.
- [24] 刘卫东.“一带一路”:引领包容性全球化[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7(4):331-339.
- [25] 习近平.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EB/OL].[2020-10-10].http://www.mohrss.gov.cn/SYrlzyshbzb/dongtaixinwen/shizhengyaowen/201811/t20181106_304290.html.
- [26]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行圆桌峰会[EB/OL].[2020-10-10].http://www.gov.cn/xinwen/2017-05/15/content_5194195.htm#1.
-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8] 任志锋.美国全球化叙事:历史、逻辑与困境[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5):132-140.
- [29] 王一桅.“一带一路”重塑经济全球化话语权[J].红旗文稿,2016(21):33-36.
- [30] 孙天昊,盛斌.墙还是梯子?——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价值冲突与特朗普政府的选择[J].美国研究,2019(4):21-35.
- [31] BENNET J. Clinton defends his policies in Kosovo, China and Mexico [N]. New York Times, 1999-08-25(D.3).
- [32] LACEY M. Clinton, winding up trip, tells developed nations not to forget the world's poor [N]. New York Times, 2000-02-13 (A.5).
- [33] CLITON B. US should not cut foreign aid[EB/OL].[2020-10-10].<https://www.cnn.com/videos/us/2017/06/20/bill-clinton-interaction-forum-sot.cnn>.
- [34] 王岳川.全球化与新世纪中国文化身份[J].社会科学战线,2003(6):195-204.
- [35] 韦宗友.战略焦虑与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及政策变化[J].南洋问题研究,2018(4):59-71.
- [36]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9-29(01).
- [37] 沈伟.驯服全球化的药方是否适合逆全球化?——再读《驯服全球化:国际法、美国宪法和新的全球秩序》[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4):2-13.
- [38] 习近平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EB/OL].[2020-10-10].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20-03/13/c_138873565.htm.
- [39] 伊丹丹.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对全球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46-59.

(责任编辑:范艳芹)

Text analysis of Chinese “globalization discourse”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YI Dandan

(College of Marxism,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590,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participating in globalization, nationstates will inevitably form “globalization discourse” in line with their interests, which would guide the globalization practice. This paper makes a textual analysis of the discourse on globalization by Chinese leade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finds out that China’s “globalization discourse” has guided China’s globalization practice from preliminary cognition, adaptation to opening up and positive response, 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active integration to active attack and active leading. Meanwhile, it has realized its own historical evolution.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Xi Jinping has put forward some new initiatives and ideas, such as “One Belt and One Road” and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which has enriched and developed China’s “globalization discourse” and led the globalization practice towards a fair, just and universal sharing direction. However, “anti-globalization” and American discourse hegemony on globalization have brought great challenge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globalization discourse system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globalization discourse”; reform and opening up